

# 《空间的生产》节译

亨利·列斐伏尔 著 晓默 编译

## 一

在数年前，空间一词有着严格的几何学意义：空间概念使人想到的只是一个空的区域。在学术意义上，对空间一词的使用通常会伴随诸如“欧几里德”、“匀质的”（isotropic）或“无限的”等形容词，通常给人的感觉是空间在根本上是一个数学概念。因此，要谈及“社会空间”（social space），就会显得有点奇怪。

并不是人们遗忘了空间概念长期发展的历史，而是必须记住的是，哲学史也见证了科学——特别是数学——从它们共同的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上逐渐解放出来。笛卡儿哲学被看作是空间概念创立的转折点，是空间概念具有成熟形式的关键。

绝大多数西方思想史学家认为，笛卡儿结束了亚里士多德将空间和时间作为范畴，而便于对感官所提供的材料进行分类和命名的传统。实际上这些范畴的状况至今仍然不甚明晰，因为它们既可以被看作是整理感官数据的简单经验工具，也可以被看作是超越由身体的感觉器官所提供的证明之上的普遍性。尽管如此，随着笛卡儿逻辑的来临，空间进入了绝对的王国。当主体与客体对立、我思呈现我在与我在对立时，空间通过容纳所有的感官和所有的身体而逐渐统治了这些感官和身体。那么空间是否就因此具有了神的属性呢？抑或是存在之物总体性的、内在的一种秩序呢？这些就是笛卡儿之后的哲学家如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和信奉牛顿学说的那些人表述问题所使用的术语。随后，康德复兴和修订了传统范畴的概念。康德的空间虽然是相对的、是一种知识的工具、是对现象进行分类的手段，也（与时间一起）相当明确地从经验领域中分离出来。它（空间）属于意识的先验范畴，并且属于内在的、理念的范畴，因此是超验的、在本质上无法把握的结构。

这些讨论标志着从哲学向空间科学的转化。要是断言这些讨论已经过时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讨论已经超越了西方逻各斯发展的各个阶段或时刻，对空间的讨

论非但没有被限制在将逻各斯引向没落的所谓的纯哲学的抽象中，反而凸现出具体和细微的问题，如对称与非对称的问题，对称的诸物体的问题，反省和反映的客观效果问题。这些都是我将回答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与我对“社会空间”的分析有关。

## 二

数学家，特别是现代意义的数学家们，是以一种与哲学明确区分的科学（因而具有了科学的地位）的主人身份出现的（科学已将自身看作是必须的和自足的）。因此，数学家们占有的空间和时间，使之成为数学领域的一部分，然而他们这样做不是没有矛盾的。他们发明了各种空间，即空间的无限性：如非欧几里德空间、弯曲空间、X维空间（空间具有无限纬度）、组合空间、抽象空间、通过拓扑学变异和转化所定义的空间，等等。具有高度概括和高度具体的数学语言，立刻对难以计数的空间作尽可能精细的分门别类（显然各种系列的空间，或各种空间的空间并没有非常现实地给予自身以概念化）。但是数学和现实，物质现实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实际上，这些领域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那些开启了空间问题性的数学家们最终又将问题重新丢给了哲学家。但哲学家除了高兴之外，却无法作为夺回其失地的手段而把握它。因此，空间变成或者说再次变成早期哲学传统（即柏拉图主义）曾提出的与范畴说相对立的东西：变成了达芬奇曾经称为的一种“心智（精神）的事物”。因此，数学理论（拓扑学）的发展加剧了旧有的知识问题：首先，数学的空间是如何向自然转化，然后向实践转化、向社会生活（假定必须在空间中展开）理论转化的？

## 三

正如思想的传统所描述的，即从空间哲学被数学所修正的过程中，被称为认识论的现代探索领域已经继承

2005/10  
总第117期

ARCHITECT 51

编译者：晓默，华中科技大学  
建筑与规划学院

和采用了空间是一种心智(精神)事物或心智(精神)场所这一概念。与此同时,集合论(set theory),作为认识论假定的逻辑,不仅吸引着哲学家,而且还吸引了作家和语言学家。其结果是使“集合”得以广泛传播,有些在实践方面、有些在历史方面,但所有的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挪用来的“逻辑”。这些“集合”或它们的“逻辑”与笛卡儿的哲学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而对精神(心智)空间概念的概括中没有任何的限制:没有人予以过清晰地阐述,依据作者个人偶然的阅读,空间概念可以意味逻辑的一致性、实践的连贯性、自组织性、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系列场所中相似性的形成、形式的逻辑与内容的逻辑等等。我们总是听到这种或那种空间:文学空间,意识形态空间,梦的空间,心理分析拓扑学等诸如此类的空间。尽管“空间”到处被提及,但很显然的是,在所谓的最基本的认识论研究的层面上,所缺席的不仅是人的概念,而且还有空间的概念。因此这类说法既不是人的理念,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因此福柯可以冷静地断言“知识也是一种主体能够占具某个位置、并通过其话语方式对客体说话的空间”。福柯从没有解释过他所指涉的空间是什么,也没有解释如何联结理论与实践之间、精神与社会之间、哲学家所讨论的空间与普通人打交道的物质空间之间存在的裂缝,而科学的态度——被认为运用认识论的思想获取知识,即是应该在结构意义上与空间领域相关联。这种关联,在科学话语看来是自明的,绝不是经过概念化的。科学话语对循环式的思维漠不关心,而将空间状况和主体状况、思维的我与所思之物对立起。因而又重新回到了笛卡儿/西方逻各斯立场上,其中有些哲学家甚至宣称已经完结了这一立场的使命。与语言学家的理论努力相一致,认识论的思想已达成了一种奇怪的结论。它剔除了“集体主体”(collective subject),即作为某种语言的创造者、作为携带特殊语源学序列的人。它将从(给万物命名的)上帝手中夺回的具体的主体搁置在一边,而以人称代词“某个”作为在普遍意义上的语言创造者、系统的创造者的代名词。尽管如此,但它却无法排除我们对某些同类主体的需要。因而重新出现了抽象的主体,即哲学家的我思。传统哲学在所谓“新”(neo-)形式下得以还魂:新黑格尔哲学、新康德哲学、新笛卡儿哲学等。这种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胡塞尔,他毫不谨慎地假定了认知主体和设想的本质(conceived Essence)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内在于生命体验之流,进而强化了形式的与实践的知识几乎纯粹的同一性。

我们同样不该惊奇的是杰出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恢复了笛卡儿的“我思”或“主体”,他特别提出了在语言层面上的存在(existence)。在该层面上,“每一个句子并不简单地代表着某类要素依据某种结构,从左到右的限

定秩序”,乔姆斯基认为,我们应发现一些从高到低组合的限定的层次。事实上,乔姆斯基毫不犹豫地假设了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精神空间,它具有方向和对称性。他完全忽略了语言的精神空间与语言在其中成为实践的社会空间之间的巨大隔阂。同样,J·M·雷(J.M.Rey)指出:“意义的呈现,就是在一个事先计算和规定好的统一系统中,沿着某一单个的水平链,合法地交换所指之物”。

这些作者,还有其他一些人所声称的绝对的逻辑严密性,实际上从逻辑数学的角度来看,犯了不折不扣的逻辑错误:他们跳过了一个完整的地带,即任何逻辑联系的必要,并以最含混不清的方法证明其合理性,还根据需要提供诸如断裂或突变的概念。他们以非连续性的名义中断了其讨论的连续性,这种方法应该在逻辑上被禁止。由此形成的鸿沟之宽和影响之深,依作者和领域的不同而变化。我对此的批判当然全力地指向克里斯蒂娃的“语言的欲望”、德里达的“写作学”、巴特的普通符号学。这一声名日增的学派,其声名与其教条化俱增,总在倡导根本的诡辩术,盲目地迷恋空间的哲学—认识论概念,使精神领域逐渐涵盖了社会的和物质的领域。尽管有些作家察觉有必要调解两者之间的分立,但大数人几乎毫不犹豫地精神领域跃向了社会领域。

在这里所发生的其实是表达了一种强势的意识形态倾向,附上其自以为的科学可信度,并以一种绝妙的无意识方式表达出来。这些思想必然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在其过程中发生了变形或分化,但最终结果是一种特殊的“理论实践”产生了一种明显地具有特别意识形态(extra-ideological)的精神空间。通过一种不可避免的循环方式,这种精神空间即变成了“理论实践”的领地,这种“理论实践”与社会实践相分离,并且还将自己设为知识的轴心或中心参照点。据此所建立的文化从这种策略中两面受益:首先,给人的印象是这种文化包容或倡导了真理;其次,发生在这种精神空间中众多的小事件可以用作论辩的结论。我会在后面论及这种精神空间与技术官僚的宁静的办公空间之间的血缘关系。至于在认识论基础上定义的知识——或多或少地与意识形态或演化中的科学有着明显的不同,难道不是直接从黑格尔的理念和伟大的笛卡儿家族的主体性相结合中承继下来的吗?

在精神空间(哲学家和认识论者的空间)和真实空间之间准逻辑(quasi-logical)的同一性预设,在精神空间和物质社会空间之间形成了一个深渊。时常有一些无畏的走钢索的人试图跨越这一深渊,上演了一幕幕的壮举,给旁观者以愉悦的颤栗。但通常的是,所谓哲学的思考会滞留于这种致命一跳(salto mortal)的建议上。如果在根本上他们还看见了这种深渊,职业哲学家则会转

移视线。不管如何有关联,知识的问题和“知识的理论”问题已被放弃,以便简化式的回归到一种绝对的或是假设绝对的知识,即哲学史的和科学历史的知识。这样的知识被认为有别于意识形态和非知识(如生命体验)。尽管这种区分是不可能的,但强调一方并不会威胁,甚至还会强化两者之间这种陈腐的一致性。毕竟,我们不知道谁会主导真理的问题?相反,我们都知道或以为知道,关于真理、幻象、谎言、表象与真实性的讨论会导向何方。

#### 四

尽管经历了长时间的挣扎,还有大量的研究和出版物,认识论的哲学思想仍然没有建立起一门学科的基础。这门学科即是或可能会是空间的学科。迄今为止,在这一领域的工作所形成的要么仅仅是描述性的,没有取得分析或理论的地位,要么就是空间的片断和局部。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尽管这种描述和片断可以提供空间中存在物的详细目录,甚至产生一种关于空间的话语,但却不能上升为一种空间的知识,没有这种空间的知识,我们就会把归属于社会空间的属性及特质转移到语言的层面、话语的层面,即精神空间层面上。

符号学因其自身(毫无限制的扩张的)知识体系的不完整性而引发了自身发展的困难;不管有多困难,其自身的动力都需求设置诸种限制。当由文本组成的符码应用到空间,例如城市空间时,会清楚的看到我们就会停留在纯粹的描述层面上。任何试图应用这类符码作为解释社会空间的方法,都势必将空间自身简化为一种信息状态,把居住于其中简化为一种阅读状态,这既逃避了历史又逃避现实。然而,在16世纪(文艺复兴和文艺复兴城市)和19世纪之间,不是曾经存在过一种建筑的、城市的和政治的符码,它构成了一种农民和市民、当权者和艺术家共同的语言,而且这种符码不仅使空间可读而且可建构吗?如果曾经存在过这种符码,那么它是如何产生的?什么时候、为什么消失了?这些问题都是接下来我要回答的问题。

至于上面所提及的局部和片断,多为错误的限定或非限定,因此也就是无法限定。实际上,对于这些零碎的观点,要想将它设计成一种科学的手段(或理论实践)去澄清和梳理纷杂的现象流中的要素,只会增加混乱。先不说数学的拓扑学在其他领域的运用,单论绘画空间中的认知学就够有趣的了,如毕加索的“阿维农少女”的空间和“戈尔尼卡”的空间。其他地方,我们总是听到建筑的、造型的和文学的空间;对(空间)这一术语的使用,更多地像是在谈论某一作家或艺术家的世界。每一专门的领域都在具有自己特定的空间:休闲空间、工作空间、娱乐空间、交通空间、公共设施,所有的都使

用着空间的术语。甚至有些专家还为“疾病和癫狂”假定了自己的空间。我们所面对的是无限种类的空间,层层叠叠,相互包容。地理空间、经济空间、人口统计学空间、社会学的空间、生态空间、政治空间、商业空间、国家空间、洲际空间、全球空间。还有大自然(物质)空间、能量流动的空间等等。

在对这些林林总总并自称具有科学性的观点进行具体的批驳之前,应该指出的是,对空间的描述和观点具有如此的多样性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所有的这些努力都证明了在当今社会及其生产方式中非常强劲,甚至是占统治地位的倾向。在这种生产方式中,智力劳动与物质劳动一样,是在不断分化的。另外,空间实践包括了社会实践的要素和环节的各个方面在空间(spatial)领域的投射,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投射尽管是相互区分的,但没有一刻放弃过在总体上的控制: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从属于政治实践,即国家权力。这一实践包含和加剧了更多的矛盾,我在后面会讨论这些问题。显然,如果在这一关键的问题上我的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寻找的空间科学就应该是:

1. 它代表着一种知识的政治功用(在西方,即是新资本主义)。记住,在这种体系下的知识或多或少地与生产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与社会生产关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2. 它也隐含了用一种刻意创造出的意识形态去掩盖其政治功用,同时还掩盖着内在于非利益化知识的高度利益化使用中的矛盾。这种意识形态并没有打着旗号,但对于那些认为实践是意识形态一部分的人来说,它(意识形态)是无法与知识区分开的。

3. 它最多体现的是一种技术乌托邦,一种在现存的生产模式的真实框架中,对未来的或可能的进行电脑模拟。其初始点就是一种与生产模式整合在一起的知识。这种令人质疑的技术乌托邦,不仅与许多科幻小说有着共同的特征,而且与建筑、城市理论或社会规划那些所有的与空间相关的项目有着相同的特征。

以上的命题当然需要解释,需要逻辑的证实。但是,如果它们能被证实的话,那是因为首先存在着空间的真理,一种可以通过分析而后显现的一种全部的真理,而不是一种建构出来的真理空间,无论是认识论者和哲学家信奉的普遍的空间,还是一些与空间相关的领域的专家们所采用的特定的空间。其次,对上述命题进行确证将包含扭转目前破碎、分离和非整体这种主导趋势的需要。这种趋势从属于一个中心或一种中心化的权力,并被作为权力代言人这样的一种知识所推进。要实现这种扭转,不可能不遇到巨大的困难,不用一种全球性的视角去代替局部的思考或管窥之见也无法将这种扭转进行下去。这肯定需要调动各种力量,而且在实际的进行中,

每一步都需要动机和方向。

## 六

由于必要的批判环节没有出现,因此还没有形成我们所需要的理论,所呈现出的只能是知识的零碎状态,或许可以类似地称作整体的理论:其目的是发现或建构一种在各个领域之间(就像物理学中的分子力、电磁力和重力)统一的理论。我们首先关注的领域是物质—自然,即宇宙;其次是精神领域,包括逻辑的和形式的抽象;第三,是社会的领域。换句话说,我们关注的是逻辑—认识论的空间,是社会实践的空间,以及感官现象的空间,包括诸如设计与方案、符号与乌托邦等抽象的产物。

对统一性的需要,可以从其他方式反映出其重要性来。在社会实践建构起的诸多层面之间,在思考所出现的问题的相互关系时,有时会混为一谈,有时又加以区分。因此,居住(人居)是建筑学所关注的东西。城镇、城市—都市空间是城市学科的领域。更大范围的空间,比如区域的、国家的、洲际的和整个世界的,这些是规划学者和经济学家的职责。有时,这些专门化的领域彼此都受到具有特权的行动者即政治家的监督,有时这些领域各自为政而没有丝毫的一致,因此不可能有共同的计划和理论的一致性。

如果能出现一种真正的统一性的理论,才能结束这种(在前面还没有对其进行全面批判的)状态。

我们关于物质世界的知识是基于最广泛的概括和最科学的抽象这种概念之上的。即使在这些概念和物质真实性之间的关系是否一致常常并不十分清楚,但我们知道这些关系确实存在,并且他们所包含的诸多概念和理论,如能量、空间和时间,彼此既不能混淆又不能分开。关于如“事物”、“自然”、或“物质现实”的通常的说法已经明显地获得了统一性。传统哲学中所使用的宇宙或世界的物质这个词(包含了有意识的人类本身),其属性可以由上面所提及的三个术语恰当地概括。当我们提及能量时,我们立刻就会注意到能量必须在某一空间中展开。当我们提及空间,就立刻会想到是什么占据着空间,如何占据的:能量的展开是在某一时间框架内,并与(空间上的)各个点相关联的。当我们提及时间,我们必须立刻会说是有什么在那里移动和变化。如果孤立的看待空间,那它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能量与时间也一样。尽管在这种意义上,这种物质很难想像(绝大多数都处于宇宙的层面),可它就存在于我们面前:我们的感觉和思维所理解的就是它。

那么借用物理学的某种模式去建立社会实践的知识以及所谓人类现实的普遍科学是否可能呢?不幸的是这不可能。首先,这种方法在过去已经失败了。其次,沿

用物理学的模式将阻碍社会理论在明显不同的层面、领域和区域采取许多有用的步骤或方法。物理学所探寻的统一性理论侧重是将各种离散的要素聚合到一起。因此,它只能作为“护栏”(guardrail),而不能作为范式。

对统一性理论的探寻绝不是要排除知识内部的冲突、矛盾和争执是不可避免的。就此而论,物理学和数学同样如此;由于剔除了辩证环节而被哲学家认定是纯粹的科学,并没有因此而免除了内在的冲突。

现在人们似乎已经确信,在物质空间中如果没有能量分布于其中,就无所谓真实性。但是,关于能量分布的形态特征、以及中心点、核子或聚合与离散的物质关系始终是一种假设。宇宙生成爆炸说即假定了一个最原始的高密度的物质核以及原始的爆炸。这种关于宇宙原始统一性的观念由于其臆想性和神秘性而遭到许多非议。与此相对,赫里(Fred Hoyle)提出了一种更为综合的理论,即能量无论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都朝向不同的方向运动。根据这种观点,宇宙的单一中心无论是起源的还是终结的,都是无法想像的。能量/时空压缩在无限多个点上(局域化的时空)。

如果在某种程度上假定的人文的空间理论在本质上与物理学的理论相联系,也许赫里的理论就是最吻合的。赫里将空间看作是能量的产物。因此能量不能与充溢于容器中的内容相提并论。原因论和目的论,由于不可避免地充斥着意识形态抽象而都被排除在外。宇宙被视为提供了各种特殊空间的多样性,而统一的理论即宇宙论所要阐明的就是这种多样性。

但这种类比有其局限性。因为我们没有理由假定在社会能量和物理能量之间,在人类的和物理的力场之间具有同构性。这是还原论的一种形式,我会在各种场合里加以明确的拒斥。同样,人类社会,如作为活着的生物体的人或抽象的人(extra-human),是不能独立于宇宙来想像的;而(不能代替那些社会理论的)宇宙论也不能脱离人类社会,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国中国。

## 七

应该用什么术语来描述从而使各种不同的空间的类型,使得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不重叠、不曲解、不分离和不突变呢?事实上,术语的选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理念空间(与精神范畴相关)与真实空间(是一种社会实践的空间)之间的距离。

对于阐述这种状态并在阐述过程中超越它的任何理论企图来说,什么才应该是其出发点呢?当然,不是哲学,因为哲学只是这件事中一个活跃的当事人。在弥合我们所关心的理念空间与真实空间断裂的时候,哲学家发展出抽象的空间再现,其中就包括笛卡儿绝对的、无

限广延 (res extensa) 的空间概念, 因其具有匀质的特点而可以用直观把握的神圣的属性。从哲学的起源与希腊城邦的真实空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事实来看, 就更令人遗憾了。这种联系在其后的哲学发展中被切断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借助于哲学, 借助其概念和理念, 但哲学不能作为我们研究的起点。

那文学怎么样呢? 显然, 有许多作家写下了大量相关的、特别是对场所和地点的描写。但是, 以什么标准来判定哪些文本与我们的研究更相关呢? 塞林 (Celine) 使用日常语言竭力再现了巴黎的空间、巴黎郊区的空间或非洲的空间。在《克利提亚斯》(Critias) 和其他的著作中, 柏拉图对宇宙空间以及作为宇宙之折射的城市空间进行了绝妙的描写。受到鼓舞的德昆西 (De Quincey) 沿伦敦街道上追寻梦中情人影子以及在波特莱尔的《巴黎纪实》中 (Tableaux parisiens), 为我们展现了堪与雨果和劳特蒙特 (Lautrémont) 媲美的对城市空间的论述。但问题是, 在文学文本中的空间无所不在, 并以各种面貌出现: 隐藏的、描述的、构思的、梦想的、推测的。但哪些文本能足以作为文本分析的基础呢? 因为所涉及到的是社会的真实空间, 那么我们会首先认为关于建筑的文本会比文学文本更合适。但不幸的是, 任何对建筑的定义本身就需要一种对空间概念的先验分析和阐述为前提。

另一种可能性是将普遍的科学概念 (就像普遍的文本概念一样) 作为基础, 比如信息与交流、寓意与符码以及符号组合, 但这些概念本身还处在发展中。这种作法的危险性在于对空间的分析将会局限于某一特殊的领域中, 不但不能对前面所述的断裂问题有所帮助, 反而可能会加剧这种断裂。剩下的只有普遍性概念了, 它似乎属于哲学而不属于任何特殊的领域。这种概念是否存在呢? 黑格尔所称为的具体共相 (concrete universal) 是否还有意义? 我所说的就是生产的和生产活动的概念, 它们就具有一种具体的共相。尽管由哲学家发展出来, 但这些概念已超越了哲学。在过去, 这些概念已公认地被一些专门化的学科所使用, 特别是政治经济学: 它们存活下来而没有被吞并。通过找回更广泛意义 (存在于马克思的一些著作中) 上的一些东西, 哲学家去除了大量的、经济学家所赋予的、幻想的精确性。这并不是说, 我们可以轻易地恢复这些概念并重新使用。“生产的空间”这一说法听起来很奇怪, 因为大多数人仍然认为虚空的空间是事先存在的, 是先于那些填充空间的东西。但问题立刻就来了: 什么是空间? 什么是生产空间? 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些已经被构想出来的和形式化了的概念置入与新内容的关联中, 而又不局限在仅仅是图解和例证 (诡辩论惯用的依据)。因此, 所需要做的是对这些概念以及相互关系在 (一方面) 逻辑数学空间

的极端形式化的抽象上, (另一方面) 在社会空间的实践感知上进行全面彻底的阐明。否则, 就会进入到黑格尔哲学的最初阶段, 导致具体共相的一种新的破碎形式: 特殊的 (对社会空间的描述和剖析); 普遍的 (逻辑的和数学的); 单一的 (即场所仅仅以其物质性和感官真实性而被视为自然的)。

## 八

当我们提及公寓中的房间、街角、市场、商业或文化中心、公共场所等, 谁都清楚它们意味着什么。这些日常话语是用来区分, 而不是孤立某些特殊的空间, 并通常用来描述一个社会空间。它们对应着那个空间的特殊用途, 因此, 它们也表述和构成了一种空间的实践。它们的相互关系是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而被处理的。那么, 我们是否首先可以列出它们的详细目录, 然后试着确定是什么范式赋予它们意义的, 是什么结构秩序支配着它们的组织?

这里有两种可能性: 一是这些词汇构成了一种未被识别的符码, 我们可以通过思考对其进行重构和解释; 或是, 在词语本身以及词语使用的基础上, 通过反思建构一种空间的符码。但无论是哪一种, 我们的思考都是要建构一种空间的系统。现在我们从精密的科学试验中了解到, 这种系统并不能直接运用于对象上, 实际上, 运用于对象上的只是某种话语。但是, 我所要概述的计划, 并不是要产生一种空间话语, 而是要通过将各种类型的空间和它们的起源形式会聚在一个统一的理论之下, 从而揭示出实际的空间生产过程。

以上的简述仅仅暗示了对问题的解决, 但我们稍后还要仔细加以分析, 以确定它是否是一个真实的问题, 抑或不过是关于某种模糊的起源问题的表述。这个问题即是: 从逻辑上、认识论上或是一般的言说 (speaking) 上来说, 语言是先于还是从属于社会空间? 语言是社会空间的前提条件或只不过是社会空间的一种明确表达? 这个语言先在性的问题从来都没有提出过。实际上, 我们可以列举很好的例证说明逻辑和认识论先在于高度清晰的语言 (用严格的规则去规范那些在大地上留下踪迹、改变自然、共同劳动等人类活动)。或许, 目前我们要揭示的是空间与语言之间隐藏的关系; 或许, 内在于清晰语言中的逻辑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空间性, 因此能够通过事物感知, 将感觉的杂多 (实践感知领域) 秩序化。

那么, 在什么程度上, 某一空间可以被阅读和译解呢? 对此, 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获得满意的答案。我前面已经说过, 如果没有足够的例证和讨论, 寓意、符码、信息等是不会有有助于我们找寻空间的起源的; 事实上, 某种已经生产出的空间是可以被译解和阅读的, 这种空间

包含了一个“意指”(signification)的过程。即使并没有内在于语言或所有语言的普遍的空间符码,也会存在着于特定历史时期建立起来的特殊符码,并有不同的功效。假如是这样的话,作为某个特殊社会的成员,利益主体们就会通过这种方式(空间的意指过程)而占有他们的空间,在空间活动中形成其主体的地位,并(在广义上)理解空间。

大致从16世纪到19世纪,如果在城镇、乡村和行政领地之间特殊关系的实际基础之上,曾经存在过一种符码化的语言,曾经存在过建立于古典透视法和欧几里德几何空间之上的语言的话,那么这种符码系统为什么、又是如何垮掉的?我们是否应该重建这种对于社会各阶层——从使用者和居住者,从当权者和技术专家(建筑师、城市设计师和规划师)——都认可的语言呢?

一种理论要想形成并被清楚地阐述,必须具有一种“超级符码”(super code)。而知识又很难完全被吸收到已经设计好的语言中去,因为知识是在概念层面上起作用的。因而不存在一种具有特权的语言或一种元语言,即便这些概念很适合“语言科学”。关于空间的知识从一开始就不能用这样的范畴来限制它。那么我们是否还需要寻找一种关于“符码的符码”(code of code)吗?也许会,但这种具有“元”功能(meta function)的理论本身并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如果空间符码确实存在,而且每一种符码都代表着一种特殊的空间/社会实践,如果空间的生产过程也形成了相应的符码,那么理论的任务就是阐明这些符码的缘起、作用和消亡。现在已经清楚了我为何提出要从这一领域的专家化工作的分析取向上转变出来:我所要强调的是符码的辩证特点,而不是其严谨的形式因素。符码将被视为实践关系的一部分,是主体与其空间和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一部分。我将努力追寻某种编码/解码(codings/decodings)的生成和消失。我的目的将集中在内容上,即所要考虑的是内在于形式中的社会(空间)实践。

## 十

如果几十年前,关于物质、精神和社会空间的统一理论就被勾勒出来,那它为什么、又是如何被放弃的?是否它覆盖的范围太大,如诗歌的、主观的、思辨的和技术实证的混为一谈而形成了真正的混乱?或只不过是探索的方法过于僵化?

为了搞清楚其中的原委,有必要追溯到黑格尔,他是政治学和哲学领域的一座丰碑。黑格尔主义认为,历史的时间使国家占据和统治的空间得以诞生。历史并没有实现个体的理性存在的原型,理性存在于机构、团体、制度(法律、道德、家庭、城市和贸易)所构成的整体中。因此,时间被固化在空间所固有的理性中。黑格尔

的历史终结论并不意味着历史产物的消失。与此相反,这种产品的生产(因知识而活跃,并受意识如语言和逻辑斯所指引)过程,——这一必然的产物——确定了它的自足性,可以通过自身的力量而持续存在。所消失的是历史,它从行动转化为记忆,从生产到沉思。至于受重复和循环所主宰的时间,因其被一种不可移动的空间(理性实现的场所和环境)的建立所控制,时间因此丧失了所有的意义。

随着这种对服务于国家的空间的迷恋,哲学和实践活动一定要探索对时间的恢复。因此,马克思将历史时间有力地修订为一种革命的时间;柏格森则更细致地提出将时间分为心理过程(mental duration)和意识的瞬间性;胡塞尔现象学将时间视为赫拉克利特式的现象流和自我主观性;其后还有整个哲学传统都在对时间做出修订。

在卢卡奇的反黑格尔式的黑格尔主义中,空间用来定义物化和虚假的意识(个人思想)。只有在(上升到崇高地位、对历史发展的曲折性一目了然的)阶级意识指引下,对时间的重新发现才能打破空间的首要性。

自黑格尔之后,只有尼采循环反复地、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下坚持空间的原初性,并将自身与空间问题一起加以关注。在“生成”(becoming)的领域(但与时间流相反),所有确定的形态,无论是物质的、心理的和社会的,都力争确立和保持自身。然而尼采的空间并没有保持黑格尔将空间视为历史时间的产品和剩余这种单一的特性。尼采这样写到:“我坚信,绝对空间是力量的基础。其后才是范围的限定和形式的构成”。

宇宙空间包容力与能量,并据此而展开。地球上的空间以及社会的空间也一样:“哪里有空间,哪里就有存在”。力(能量)、时间、空间之间的关系令人费解。例如,人们既不能想像一个(宇宙的)起源,也不能没有这种关于起源的理念。一旦辨识和标志差别的活动(尽管是基本的)从视野里消失,“断裂与连续也就中和了”。力与能量只有通过空间中的作用才能被识别出来,即使是力自身,其作用也是各不相同的。那又如何能通过知性分析而完全把握能量、时间和空间的任何真实性呢?正如尼采的空间概念与黑格尔的完全不同一样,尼采的时间概念是一个普遍的悲剧剧场,是生命与死亡之循环往复的时空。它与马克思的时间概念——即那种受生产力所驱动、并受工业的、无产阶级的和革命的理性充分引导的历史性——也完全不同。

在此,或许需要回顾一下我们都见证了的、20世纪下半叶所发生的一切。

1、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强化。它通过一切力量来维持或压迫社会;在知识和科技的帮助下,国家规划和组织社会理性,不管其政治意识形态、历史背景或当权



者的阶级出身，都实施着相似的（即使不是一致的）职能。通过将差异简化为重复和循环（赋予其平衡、反馈和自我调整等名号）而碾碎了时间。空间以黑格尔的形式恢复了其自身。这种现代的国家提倡并强行将自己作为（民族的）社会和空间的稳定中心。正如黑格尔所预言的那样，作为历史的目标和意义，现代国家使社会和文化领域变得平淡无奇。它强化或执行着一种使矛盾和冲突终结的逻辑。对于反抗者，国家则采取阉割和镇压的手段使其就范。这是否就是社会的熵、抑或是已变成常态的巨大毒瘤呢？无论答案如何，其结果就在我们面前。

2. 尽管如此，在同一的空间中，其他力量也在沸腾。因为国家理性以及技术的、规划的和措施的理性必定要激起反抗。权力的暴力必然招致颠覆的暴力。战争与革命，失败与胜利，对峙与骚乱，现代世界与尼采悲剧性的预见完全一致。国家所确立的规范永远都会受到挑战。至于时间和否定性，无论何时出现，只要一出现（必定会出现），就必定是爆炸性的。这是一种新的否定性，一种通过不断的暴力而显示自身的悲剧式的否定性。这些沸腾的力量始终冲击着国家和空间之压迫的阀门，因为差异决不会被弃绝。尽管会遭受挫折，但它们存在着，并不断发动更猛烈的斗争以证明自己，在斗争中改变自己。

3. 工人阶级并没有放弃。他们继续斗争着，有时是地下的，有时是公开的。要避免阶级斗争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阶级可以有无数种形式，而不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已经枯竭的那种形式，这种斗争形式在马克思那里是找不到的（不管它号称多么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目前，斗争的力量似乎达到了一个生死攸关的平衡点，使得工人阶级的斗争不再是一种公开的对抗。因此，当国家在原地腐朽或歇斯底里地自我确认的时候，社会在不断地动荡。或许在经历了一段时间沉默之后世界革命就会爆发，或许世界战争会仿效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上循环。总之，一切迹象表明，目前工业化国家的人们既不能选择无止境地增长和积累，也不可能通过暴力革命使国家消亡，而只能使工作（work）本身枯萎。仅仅想一想这些可能性，就会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不会也不可能消失。黑格尔、尼采和马克思的命题和假说仅仅是一个开始，并且伴随着巨大的困难。至于哲学思想和对空间和时间的思考也有着分歧。一方面，我们拥有时间哲学，即持续时间的哲学，其自身又有局部的思考和侧重点：历史时间、社会时间、心理时间等等。另一方面，我们有认识论的思想，它建构了一种抽象的空间和对抽象（逻辑—数学的）空间的思考。如果大多数作者不是打着心理（新康德和新笛卡尔主义）空间的旗号的话，那么“理论实践”就只不过是西方专门化的知识分子自我中心式的思考——实际上不久就会变成完全孤立的、分裂的

意识。

本书的目的是要打破这种状态。更具体地说，就是要直面那些与空间相关的，阐明了现代世界的（哪怕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主张，不把它们看作是孤立的命题和假说，不把它们看作是微观视角的思想，而要将它们看作是现代性来临的预示。

## 十一

这一目的并不意味着要针对现存空间详述一种批判理论，不是要取代对空间的描述和剖析，也不是要取代涉及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通常的批判理论。用一种否定性的、批判性的空间乌托邦去代替占统治地位的技术乌托邦是远远不够的。在被限定在现实的对立面之后，批判理论，即便是具有最激进的形式，不论是有针对性的（punctual）（如转攻弱点）或是全球化的，都已是昨日黄花。

有人会建议我们应该首先把重点放在对空间符码的系统的破坏上，但这样做并不会取得什么进展，因为与知识和社会实践有着内在的联系的符码早已开始解体了。遗留下的只是一些残片，词语、意象和隐喻，这是我们始终忽视的，因此必须时时牢记的创纪元式的、历史事件的后果。事实上，在1910年左右，某种空间被打破了。它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的、社会实践的、政治权利的空间，一种隐藏在当时的日常话语中和抽象思维中的空间，隐藏在交流的环境和渠道中的空间；这种空间就是从希腊传统（欧几里德和逻辑）基础上，经文艺复兴发展而来，体现在西方的艺术和哲学以及城市和城镇的形态上的古典透视和几何化的空间。这种空间遭受如此大的冲击，以至于现在所留下的只是微弱的学究式的现实，只是在保守的教育体系中苟延残喘。作为一种参照系统，欧几里德和透视空间已经消失，与其一起消失的还有昔日的“日常场所”，如传统城镇、历史、父权、音乐中的调式、传统道德观等等。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当然，通常意义上的空间，欧几里德空间和透视主义的空间不会像青烟一样在我们的意识、知识和教育方法中消失的无影无踪；它们只能在基础代数、算数、语法、牛顿物理学中起作用。因此，事实上要以一种批判理论的名义去摧毁这些符码已为时已晚；我们的任务则应该是描述它们已被完全地摧毁、去测度所造成的影响，或许通过一种理论的“超符码化”（supercoding）去建构一种新的符码。

这里一定要强调的是我们无须去替代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倾向（不管我们曾经对此多么渴望过），而是要逆转这种倾向。正如我将详尽地显示的那样，即便不可能绝对地证明，但还是要坚持对这种倾向的逆转，就像是在马克思的时代一样，从产品（无论是一般意义的还是特

殊的、是描述的还是枚举的)向生产的转移。

这种意义和倾向上的逆转与把所指要素变成能指(一种在纯理论性思考旗帜下的实践)无关。对所指要素的剔除、将表达性置于括号中,仅仅诉诸形式的能指这些操作应该是从产品向生产活动转向之前的事情了,它们只是通过将这种扭转简化为一系列在语言(本质上是文学的)层面上的抽象介入而模仿着这种逆转。

## 十二

(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的产物。这种提法好像类似于同义反复,因此也过于明显。在接受这个命题之前,我们有理由好好地思考以下它的含义和结果。许多人很难接受这一观念,即空间在现有的生产方式中、在现实社会里具有自己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与全球化过程中的商品、金钱和资本既相似又有区别。许多人发现这很矛盾,需要证明。如果进一步提出在这种状态下生产出来的空间亦是服务于思想和行动的工具,那么分歧会更大:除了作为一种生产的工具,它还是一种控制的工具,因而也是统治和权力的工具;然而,这个空间也部分地摆脱了那些想利用它的人的掌控。那个造就了这种空间的社会和政治(国家)力量现在试图完全掌控它,但并没有完全做到,那股曾经推动使空间的真实性走向某种无法掌控的自治的特殊力量,现在却极力要打倒它,并束缚和奴役它。这种空间是抽象的吗?是的,但在具体的抽象意义上它又是真实的,就像商品和金钱一样。它是具体的吗?是的,尽管它不像某一物体和产品那样具体。它是工具吗?毫无疑问是的,但它像知识一样又超越了工具性。它被简化为一种投射、一种知识的对象化吗?是,但又不是:物化于产品中的知识与理论状态的知识不再共存了。如果空间包含了社会关系,它是如何包含以及为什么会包含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正是因为有这些问题的存在,因此需要进行彻底的分析 and 全面的阐释。这必须包括新理念的引入。首先是空间的差异性 or 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与对永恒的空间进行分割和剖析所得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些新理念必须置入通常所说的历史的文脉中,从而使历史显现新的光照之中。

社会空间将以某种特殊性而显现,在一定程度上,一方面,它不再会与心理空间(像哲学家和数学家定义的那样)混为一谈,另一方面,也不会与物质空间(像实践—感觉活动和对自然的知觉所定义的那样)混为一谈。我所试图证明的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空间,即不是通过事物的汇集或感觉数据的堆砌而构成的,也不是由装满了各种内容的空壳构成的,要证明的是它不能被简化为强加在现象、事物、自然的物质性上的一种形式。如

果我是对的,那么空间的社会特性(在这里被设定为初步的假说),将会在下一步加以论证。

## 十三

如果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这一命题是真实的,那么这一事实是如何被掩盖的呢?其答案是:被一种双重的幻想所掩盖。这两种幻觉都彼此关涉、相互强化和相互掩盖。其一是透明性的幻想,其二是非透明性的幻想,或“现实主义”的(realistic)幻想。

1. 透明性幻想(the illusion of transparency)。其中,空间呈现出的是光明的、可理解的、给行动以完全的自由。在这种空间中所发生的一切给予了思想以奇异的特性,并通过设计(具有双重的语义意义)使其具体化。设计成为了心理活动(创造)和社会活动(实现)的一个中介(忠实的中介),并在空间中展开。与透明性的幻觉结合在一起的是将这种空间视为单纯的、无陷阱和无隐秘所在的观点。因此,任何隐藏的和伪装的(因而是危险的)都是透明性的敌人。在透明性的统治下,那个心理之眼(mental eye)将照亮其沉思的东西,一切皆一目了然。“理解”(comprehension)被假定为不会遭遇不可逾越的障碍,并可将其感知的,如对象,从阴影中引至光明处。假定有两种方式可以实现被感知对象这种状态的置换,一是通过光的射线击穿它,二是小心谨慎地将其从昏暗转向光明的状态。因此,也就假定了社会的与心理的空间、思想的与述说的(拓扑学的)空间之间存在着大致的共存关系。那么,思想又是通过什么途径、依靠什么魔力而产生的呢?这个假定就是所谓的被编码的现实(encrypted reality),只要有首先是言说、然后是书写的介入就会很容易被解读。据说(并且相信),这种解码方式只能通过场所互换(transposition)、通过对如此严格的拓扑学变化的阐明来实现。

有什么理由认定在空间领域中已知的与透明的是一回事呢?事实上,这种主张是自古典哲学就通行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基本假设。这种与西方文化有着紧密关系的意识形态强调言说,并过分强调书写文字,从而损坏了社会实践,实际上它是有意掩盖了社会实践。对口头文字或言说意识形态的盲目崇拜被书写意识形态和对书写的盲目崇拜所强化。对有些人来说,无论是暗示或明确地认为,言说取得了交流的全面清晰性,清洗掉了一切隐晦的,或迫使隐晦的显露自身,或通过诅咒的力量将隐晦驱除。还有些人认为单是言说还不够充分,还要引入(既是邪恶的又是神圣的)书写文字的检验和行动。除了直接的效用以外,书写行为被假定暗含了一种有助于(书写或言说着的)主体把握客体的训练(discipline)。无论哪一种形式,言说和书写文字被认为是实践本身:它假定无须相应客体的消失,(被当成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



的)荒谬性和隐晦性就会被驱散。因此,交流就把不可交流的东西带入了交流的领域,而除了那个曾经被追逐过的痕迹以外,就没有不可交流的东西了。这就是置身于空间透明性、确定的知识、信息和交流中的一种意识形态假定。正是在这个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相信单凭交流就能带来一种革命性的变革。

“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述说!对言说来说没有时间的限制!所有事情都必须写出来!书写改变语言,由此书写改变社会!书写是一种表意的实践!”。这样的叙事过程其结果是将革命与透明性混在了一起。

透明性的幻想原来是一种先验论的幻想(暂时回到旧哲学的术语体系中):是一种诡计,它运作于自身近似神秘力量的基础之上,但是,通过同样的记号而立即涉及了其他的诡计——(这些诡计)是其托词和面具。

2. 现实主义幻想(realistic illusion)这是一个关于自然界的简洁性的幻想——很久以前就被哲学家和语言理论家在不同层面、以不同的名义拒绝的一种天真态度的产物,主要因为迷恋于自然性和实在性。优秀的老牌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对常识特有的盲信会导致错误的认识,即认为事物比“主体”、比其思想和欲望有着更多的实在性。对这种幻想的拒绝就意味着坚持“纯粹”的思想、坚持心(Mind)和欲望。结果在放弃现实主义幻想的同时不料又跌入了透明性幻想的怀抱。

在语言学家中,语义学家和符号学家最初(实际上是最终)天真地认为,语言与其受形式的限定,不如说具有一种物质的真实性。根据这种观点,语言就像是装满语词的口袋,每一事物或对象都可从中挑选出合适和恰当的词语。在如何阅读过程中,在想像和象征的纬度中,顺着读者路径的景色和地平线都被当成真实的,因为文本的真正的特性——表达的形式和象征的内容——对于读者潜意识的天真来说是一张白纸。

实在性的、自然的和空间不透明性的幻想培育了自己的神话学。人们总是认为,有着空间取向的艺术家所从事的工作是在(从母亲般自然的领域中直接释放出来的坚硬和密实的)真实性中进行的。他们可能更像是雕塑家而不是画家,更像是建筑师而不是音乐家或诗人。这种艺术家所要处理的各种材料总是抵抗或规避着艺术家的努力。当空间不再被几何学家所统揽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具有地球上物质的质量和属性。

透明性的幻想与哲学的唯心主义有着亲密的关系;而真实性的幻想与(自然主义的和机械论的)唯物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这种两种幻想并不像有些哲学体系那样势成水火,并试图摧毁对方。相反,这种两种幻想彼此包容和滋养。因此,在单独对这两种幻想进行考察时,同样重要的是要考察两者之间来回转换、考察所产生的若隐若现和摇摆不定的影响。源自自然界的象征

主义可以遮蔽西方(从其历史和对自然成功征服中继承来的)理性的清晰性。衰退中的模糊的历史和政治力量(国家、民族主义)所具有的明显的半透明性可以在自然或土地上父性和母性中找到它们形象的源泉。理性被自然化了,与此同时,自然为其自身披上了(替代了理性的)乡愁的外衣。

## 十六

事实上,社会空间与社会行为结合在一起,与那些有生、有死、受苦和能动的个人或集体的主体性行为结合在一起。从主体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空间行为是有生命和死亡的:在空间中,他们发展和表达着自身,并且遭遇禁忌;然后他们死亡,在同样的空间还包含着他们的墓地。从认知的角度来看,社会空间(与其概念一起)是作为社会分析的工具。接受这一观点就意味着要立刻剔除在社会行为与社会场所之间、在空间功能与空间形态之间那种简单化的——对应的模式。而正是因为这种结构图式的粗陋,它时常出没于我们的意识和知识中。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要产生一种合适的社会空间,并通过自我表现和自我再现而使其获得某一形式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社会空间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并不是同一的,它既是墓地也是摇篮。事实上,这种创造行为是个过程。只有该社会的实践能力和统治权力具有了其特殊的场所——宗教和政治场所,这种创造(空间)的行为才会发生。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更容易通过人类学、人类文化学和社会学而不是政治经济学来理解),象征着交媾与杀戮的场所是必须的,在这些场所中,繁衍的原则可以得到更新,而父亲、酋长、君王、牧师、有时是神灵会被处死。因此,空间被神圣化了,同时又受到正义与邪恶两种力量的保护:这个空间保留了这些力量中有助于维系社会延续的因素,而掩盖这些力量危险的一面。

更深一层的必要性是,自然的和社会的空间、实践的和象征的空间应该被一种更高层次的(能指和所指)实在(reality)所充斥和占据。被光,如太阳、月亮和星辰之光以及与之相对的黑暗,如夜晚所充斥和占据。光等同于真实、生命,因此也等同于思想和知识,最终通过中介而不是直接明确地等同于已建立的权力。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通过神话已经给了我们许多的暗示,但是它只能在空间中并通过(宗教—政治的)空间而得以实现。就像所有的社会实践一样,空间实践在其被概念化之前就直接地存在着,但是对思辨而不是生活的推崇使得实践与生活一起消失了,这在本质上对生命体验所具有的无意识层次是不公平的。

另外,家庭(可以很大,但一定会有规模限制)不能作为社会实践的惟一中心或焦点,因为这将导致社会

的解体；但同时，家庭被作为（个体的）人的以及与自然、大地、生育和再生产直接关系的基础而被保留和维持着。

最后，死亡必须被再现和拒绝。死亡也有其特殊的场所，但这种场所却是位于适当的社会空间之上和之下的；死亡被放逐于无限的王国，以便解放（或净化）社会实践发生的、及其所建立的占支配地位的法规的有限性。社会空间一直是社会的和社会生活的空间。人不能单靠文字而生活；所有的“主体”都置身于某一空间中，在其中，他们必定要确认自己或迷失自己，对这个空间既喜爱，同时又改造该空间。但矛盾的是，为了进入这种空间（实际上已经在空间中），个体（儿童和少年）必须通过各种考验。这影响了在社会空间中对保留空间的设置，比如行成人礼的场所。所有神圣和邪恶的场所，神灵在场和缺席的场所，与死神相关的场所，与暗藏的力量以及他们驱魔相关的场所——所有这类场所都有资格被保护起来。因此在绝对空间中，“绝对”是没有位置的，否则它将成为一种“非场所”；宗教—政治空间具有一种相当奇怪的组成，是由分离的、保留的并且是非常神秘的区域构成的。

至于说魔力和巫术，它们与宗教—政治空间相对，也有自己的空间；其空间也是分离和保留的，只不过这类空间是受到诅咒而不是被祝福或仁善的。与此相比，某些嬉戏的空间，部分地用于宗教舞蹈音乐等，则始终是仁善的而不是邪恶的。

毫无疑问，有人会争辩说：社会空间的根本基础是禁忌。并且举出如下的例证支持这一论题：在一个社会中，成员之间的交流还有着没有说出的东西；社会成员之间的鸿沟，其身体和意识之间的鸿沟，社会交往的困难；他们最亲近关系的错位（如孩童与其母亲的关系），甚至其身体完整性的错位；最后，在由各种禁令和诅咒限定出来的一系列区域环境中，这些关系永远不会获得完全地恢复。

沿着同样的思路，可以用双重的禁忌来解释社会空间：其一是将（男性）孩子与母亲相分离的禁忌，因为乱伦是禁止的，其二是将孩子与其身体相分离的禁忌，因为在构筑意识的过程中，语言打破了身体无须中介的统一性，换句话说，（男性）儿童经历了象征性的阉割，对他自己来说，其阳具已经外化为现实的一部分。因此，母亲的性和血与性快感一起都被放逐到受诅咒与神圣的领域，因而也被蒙上了神秘和不能接近的色彩。

但问题在于，这种观点假设了逻辑的、认识论的和人类学语言之于空间的优先性。同样的道理，它只对社会的起源设置了禁忌，如禁止乱伦，但对生产行为则没有设置禁忌。这种观点把空间阅读成一种先在的客观、中性和虚空的东西，并仅仅认为言说（文字）的空间才是某种被创造出来的东西。这些假定显然不能变成对社会/空间实践的一种合理解释的基础。它们只适用于一种想像的社会，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和模式，这种社会的意识形态是臆想出来的，然后又专制地与所有真实社会相等同。在男根崇拜的垂直性空间中的存在（它有着很长的历史，只是现在变得更为普遍）仍然迫切需要解释。对于那些既限定（会发生一些事情的）有景色的区域也限定那些（不能或不会发生事情被放逐的）猥琐的区域的墙体、围合、立面同样需要进行评说。那些不能被接纳的事情，可能是邪恶的或是禁忌的，于是就在靠近或远离边界的地方占据着它们自己的隐匿的空间。如果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根据潜意识来解释每一件事情的话，确实会导向过分的简化主义和教条主义；会导致对结构化的过分强调。但是结构确实存在，潜意识也确实存在。这种很少被了解的因素将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提供足够的证明。例如，假如每一个社会、特别（因为我们的目的）是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地下的受压抑的生活，因而会有自己的一种潜意识的话，那么无疑会吸引精神分析，而目前处于没落的精神分析也将继续延续其生命。